全国累计发卡量已突破1.8亿张,公众质疑声一直不断——

多城市一卡通巨额押金去向成谜

集乘车、餐饮、缴费等功能于一体的公交一卡通，正在越来越多的城市落地生根。自2000年至今，我国城市交通领域一卡通累计发卡量突破1.8亿张。巨额押金及利息去向何处，一直备受关注。

“退卡不退押金？收了钱也不给发票？”今年3月,因申请退还一卡通押金遭到拒绝，北京市民刘巍向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有限公司及有关部门递交了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IC卡成本明细、押金及所产生的利息去向,至今未果。

押金定价各不同

《北京市市政交通一卡通卡发行使用办法》规定:申办人申办时须缴纳每张卡20元押金，办理退卡时回收卡片,退还押金,人为损坏的卡片在办理退换时,收取20元成本费。

对于刘巍为什么拿不到押金，工作人员给他的答复是已经损坏的卡是不给退费的,也不给票据,并称这是“公司的规定”。”

“即使卡坏了,公交IC卡也不值20元啊！”刘巍说。

此前媒体披露,北京一卡通属于CPU卡,成本共为9元左右。自2004年起,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有限公司指定的卡片封装厂商是北京中安特科技有限公司。同样由这家公司负责封装的山东省济南市公交IC卡,自2008年7月以来一直执行每张卡10元的押金收取标准。那么,北京一卡通的成本为什么定价20元呢?

2007年6月至8月,北京市审计局对一卡通的成本及押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当时审计一卡通的成本构成是：约45%的采购成本、约30%的注册用软硬件系统及相关费用、约8%的发行费用等。当时卡片发行初期成本相对较高，但预计交通卡的净保有量稳定时“每张市政交通卡的成本为20.5333元”。

在陕西省西安市办一张“长安通”卡,需要交押金18元。

江苏省南京市的“金陵通”卡每张押金30元,引发不少争议。而同样30元押金的广东省广州市的“羊城通”卡,近日已公布将调低押金数额至每张卡20元。

去向一直不透明

长期致力于对城市一卡通押金收取问题开展反垄断调查的律师董正伟认为：押金的收取是“不合法的”。居民乘车买票,相当于用户与公交公司签订了合同。“有谁听说过签订合同需要押金吗？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居民先买票后乘车,已经形成了额外的担保，还需要押金干什么呢？”

“押金的使用情况不公布,更是对民众知情权的侵害。”董正伟说。

北京市政协委员石向阳曾就公开北京一卡通押金使用情况连续6年提出提案。他认为这一问题至今仍未得到合理解决:“首先应该定性,到底是押金还是成本?如果是押金就有必要向持卡人公示数额、去向等信息,如果是成本,就把成本计算出来。”

南京市民卡有限公司对押金的去向含糊其辞,引发市民质疑。记者致电该公司,公司一位负责人表示,押金沉淀所得主要用于支持金陵通卡的成本和系统的运营,除此之外,一些免费或公益性项目的支出也来自押金。但具体金额至今未公布。

广州的羊城通公司则委托了第三方审计。审计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12月31日,广州羊城通卡共发行935.25万张，所收取的押金共计2.039亿元，累计利息476.75万元。羊城通公司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国家层面对资金管理的严格要求，羊城通卡押金和利息至今仍存放在银行中,“除了为用户退还押金外,不做其他任何用途。”

要的是本明白账

针对押金使用问题，北京一卡通公司曾公开回应称是购买备用卡,以做好出售、换卡等准备。对于持卡人缴纳的卡片押金，公司会统一归集到指定的合作银行专户管理，并设置专门会计科目对其进行单独核算。

对此回应，刘巍并不满意:“作为约4000万名持卡用户中的一名,我有权利知道押金的具体用途是什么,一卡通公司也有义务定期告知我们。我们要的是一本明白账！”

中国青年报（梁鑫 庄庆鸿）

新的矛盾碰撞

图/Newscartoon 作者 杨良义

为制毒运输感冒药按贩毒处罚

个人药用购买或携带无碍

京华时报 昨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走私、非法买卖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意见》首次明确,以加工、提炼制毒物品制造毒品为目的,购买麻黄碱类复方制剂,或者运输、携带、寄递麻黄碱类复方制剂进出境的，分别以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罪、走私制毒物品罪定罪处罚。

最高法新闻发言人孙军工称，近年来，传统毒品在涉案毒品中的比例逐年下降，甲基苯丙胺等合成毒品的比例迅速上升，而麻黄碱类物质是制造甲基苯丙胺等苯丙胺类合成毒品的主要原料。

孙军工称，当前麻黄碱类复方制剂的流失方向主要有两个：一是流入制毒渠道。我国近年来查获的制造甲基苯丙胺犯罪中的制毒原料一半以上是麻黄碱类复方制剂,部分地区已形成非法买卖麻黄碱类复方制剂加工、提炼麻黄碱类物质制造甲基苯丙胺的产业链。二是流入制毒物品交易市场。部分犯罪分子不再直接实施制造毒品犯罪，转而利用麻黄碱类复方制剂加工、提炼出麻黄碱类物质后进行走私、贩卖。

孙军工称，药品企业合法生产、经营、进出口麻黄碱类复方制剂以及个人出于药用目的,购买或者携带少量麻黄碱类复方制剂进出境的,都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王丽娜 孙乾)

子女“常回家看看”入法遭质疑

专家:没有可操作性,不等于没有可诉性

新京报 昨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在草案形成过程中有较大争议的“常回家看看”精神慰藉条款,写进了草案。

《草案》规定,“家庭成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有人认为，该条款不具备可操作性,影响法律的权威性。

截至2011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8499万人，占总人口的13.7%。

参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起草的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肖金明认为,《草案》首次将传统道德观念和传统文化也就是孝文化入法,“更具指引教育作用”。

他表示,首先应该界定清楚《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是保障法,还是责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具有鲜明的社会法属性，所以会从鼓励、倡导的角度,设定条文。不仅仅是‘常回家看看’条款,其他一些政策性责任条款,同样不具备可操作性”,但起到的是明确政府、社会、个人责任的效果。虽然没有可操作性,但不等于没有可诉性，依据这些条款，可以评判是非、确定权责,“比如司法实践很棘手的家庭纠纷，起作用的正是这类道德义务条款、责任条款”。(王姝)

SAT高分,管用吗?

——一位从国内考入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讲述她眼里美国名校的“招生法则”

波士顿剑桥镇马萨诸塞大街77号,是小舟和记者见面的地方。我们身后,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地标建筑“大穹顶”。

“最近几天,来学校的旅游团特别多,时常听到有导游在用中文讲解。”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中学生“想到全美排名前50的大学读本科”,这种“励志之旅”正流行。只是,像麻省理工这样的名校,更想选择怎样的学生？小舟说,她是来到“大穹顶”之后才看透这件事情的。她告诉了记者一个数字:20,“本科四届学生加起来，真正从大陆考过来的,也就20出头。”

“萃取”——全球生源

小舟在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读本科,今年大三。她很清楚,SAT高分根本不是她被录取和给予全额奖学金的主要原因。

她曾经连续3年获得国际奥数金牌，曾是奥数国家集训队成员。虽然如今小舟很不愿意说这个,但她知道:不挑明了,就不能把很多高中生从“SAT的迷梦”中叫醒。

小舟出国前,家乡好几家报纸和杂志争相报道她的事迹，但都“正确”地隐瞒了一个关键信息:从小学起她就进了奥数培训班,然后接受了长达10多年的奥数训练——这会把很多人逼疯,却成就了像小舟这样真正热爱数学且有超强数学才能的人,也把她送进了世界名校。

“在这里,拿过各种国际大赛金牌的学生多的是,不稀奇。”小舟身边的那几个大陆同胞,她赴美前就有印象,“有一个拿过物理金牌,比我高一届；有两个先被北大录取,大二才来这里,也都是我们这种级别的‘选手’。”

生源是名校的生命线——这是一条“招生公理”,世界通行。名校招生,小舟形象地打了个比方,是在“萃取”:“美国名牌大学强调文化多元化、生源国际化,所以招生时会在世界各地、各种族、各民族的尖子生中按比例萃取若干。”

“气质”——讲究精准

萃取,不同的名校有不同的标准。

当初申请学校时，小舟更心仪普林斯顿和哈佛,但被婉拒。她后来看懂了：不同名校对学生各有“气质”的要求,这一点恰恰最容易被国内学生忽略。

“曾经很不服气,想不通为什么被拒。”在波士顿剑桥镇,麻省理工学院跟哈佛大学紧挨着。小舟去隔壁的哈佛听过课,也渐渐结识了不少哈佛的学生,最终想通了:“哈佛更喜欢招收有‘领袖气质’的学生,果然,他们在大学里总忙着给自己组织的各类活动拉粉丝,总能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我真要去了那里,肯定像个傻瓜,也会被烦死。”性格沉稳文静的小舟,如今已经释然:除了分数、能力之类,各名校对学生的性格、特长更有诸多细节要求,很讲究精准度:“国内大学招生,是用考分做网眼、撒网打鱼；美国大学招生有点像钓鱼,而且只钓某几个品种。”

后来,还有人向记者道出了去美国读书才能知道的一个“文化秘密”:“美国很多名牌大学所称呼的‘校友’，并不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只有那些被精挑细选进来读本科的学生,才被认为是‘校友’。”学校按照“同气相求”的原则挑来本科生,而由他们体现、延续学校一贯的“气质”。

弄明白了这些背景，再来看SAT高分,就不难明白:它管用,但程度有限。指望考得高分就进名校,那是中国式思维。

大多数没能进名校的中国学生,比较尴尬,“洋高考”没有退路,只好往前走,“很多留学生一不小心就落到了三线大学或社区大学。当然,这对美国经济有利。”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很多大学出现了财务危机，招揽留学生便成生财之道。“你在这里待久了,才知道哪些学校、哪些专业值得读,哪些则是学校专门拿来谋财的。”

单说波士顿，就有近百所大学和学院，很多学校连当地美国人都不怎么知道。这儿是美国“教育创收”的一个重镇，每年5月底6月初，波士顿全城的酒店房价总飙升得离谱,连位于远郊的汽车旅馆,都动辄开出每晚250美元以上的吓人价格,竟然还一房难求。个中原因,倒是波士顿人全都知道的:“这城里近百所学校都在办毕业典礼，毕业生的家长们从世界各地赶来参加。”

“融合”——真的很难

在大洋的这一边,越来越多中国家庭为了孩子留洋,下决心“卖掉一套房”。但孩子要走的这条路上有怎样的风景，他们还不了解。正因为不了解,所以有种种美好的想象,兴致很高。

“到美国读大学,最大的困难不是学业,而是融入当地社会。这很难,真的很难。”留美之前,不少过来人告诉小舟，比起读博士,读本科的一大好处是融入美国社会相对容易。但日复一日的生活,总不时在提醒小舟,“相对容易”跟“容易”不是一个意思。

比如打牌。当中国留学生围在一起玩“三国杀”，美国同学也在玩自己的牌。“有好几次,他们邀请我试着玩玩。我很快熟悉了他们玩的牌的每一条规则，但真的玩不到一起,感觉融不进去,别扭得很。”那是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我们从小到大看过许多美国卡通片和电影，但来了之后竟然发现,美国同学没看过,他们从小到大看的是另一些卡通片、电影和电视。玩牌时或其他时候谁说一句逗笑的话，他们一听就乐开了,可我十有八九听不明白。”

在国内,不少人反对“低龄留学”，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沈祖尧和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都表达过差不多的看法: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差异,并不是小留学生能够轻易适应的,“适应不了差异,会让你在国外过得不好。”

而有些过来人看得更远,“过得不好”很可能不只是一段时间——所谓的“适应期”,也不只是在国外的若干年。“许多人还是想回国发展的,或者想留在国外却留不下来;而一旦回到中国,他们很可能也会‘过得不好’。因为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小留学生更是在观念、行为方式形成的关键时期就待在国外,或多或少‘西化’了的人,回国后能否适应国内的社会环境、人际关系,又是一道坎！”

文汇报（樊丽萍）